

「三個全力支持」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議事 鍾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提出希望香港「不斷增強發展動能」，為此中央將給予「三個全力支持」。7月1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解讀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時，指出「三個全力支持」是中央送給香港的一份「大禮包」。用足用好中央「三個全力支持」，將為香港發展增強動能。

深入領會中央這份「大禮包」的深意，方能理解「三個全力支持」為香港增進賦能的實踐邏輯。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獲取發展機遇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相比以往的「惠港」專項政策，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將打開一扇「機遇的大門」，「大門」的後面，是推進黨

家發展戰略而設立的更大更全的政策體系。這些政策將涉及更廣的功能維度、更廣的區域尺度和更大的創新力度。「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表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令香港獲得新的發展空間與機遇，是實現香港由治及興的必然選擇。

為香港打開「機遇的大門」

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例，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粵港澳三地在經濟、民生以及軟硬環境建設等多個領域開展了持續性的合作制度創新，日益完善的區域合作政策體系為港澳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到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和生活提供越來越多的便利，為資金、貨物、技術以及人員等要素的跨境流動提供了堅實的支持，由此為香港市場注入了持續的發展動能。

另一方面，前海、橫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在國務院近兩年先後印發的建設方案指引下，均以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建設指導，圍繞產業合作發展、青年合作交流、社會民生保障銜接、合作對外開放等多個維度構建了相應的政策體系，由此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提供了新的空間。

參與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展現獨特地位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滿懷夢想的創業者來此施展抱負。」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正需要港澳展現獨特地位與優勢。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普通法制度、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優勢，既是香港服務於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亦是香港發展動力增長的重要基礎。

試從金融領域看，香港是內地企業的國際融資平台，具有聯通境內外金融市場的紐帶作用。以債券市場為例，自2017年以來「債券通」的「北向通」與「南向通」先後上線開通並平穩運行，五年來境外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總量年均增速約為40%，目前持債總規模約3.7萬億元。境外投資者通過香港投資到內地，不僅有助於內地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和開放，也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和新的動力。

再從創新科技領域看，世界級的大學學科、高水平的研究機構和實驗室等科研平台，為高水平的科研人員提供了集聚和

創新的平台，構成了香港創科發展優勢的基礎，當前香港已具備國內外一流研究平台聯繫及合作的能力與條件。以特區政府設立的「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為例，至2021年底，已有近30所研發實驗室獲選進駐該平台，並在平台的支持下與全球知名學府合作，在健康、生物醫學、機器人工程和人工智能等領域開展研究。通過此研發平台，不僅能將香港的科研帶到世界舞台，也能將世界知名的研究團隊帶到香港。一方面增強創新科技對本地經濟體系升級的能力，另一方面助力國家科技創新的提升。

推進改革釋放創造力與活力

在發展中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增強發展動能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習近平主席多次深刻指出，對於香港而言，「發展是永恆的主題」「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當前，香港正處在從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新的發展形勢與發展需求，需要直面內外的複雜因素與發展中存在的困難，通過積極穩

妥推進改革，為本地營造更為優良的發展環境，以進一步提升本地的競爭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之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指出「建設好粵港澳大灣區，關鍵在創新」。為創新推行改革，不僅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需要，港澳亦同樣需要。同時，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為香港提供的新機遇，亦有助香港推進改革，以新的增長模式破除既有的利益固化藩籬、以新的產業領域釋放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人釋放創造力與活力。

2018年4月30日，被稱為港交所25年來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正式生效，改革內容涉及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經濟公司在香港上市。2020年，雖然全球經濟遭遇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但在生物科技及新經濟公司融資強勁增長勢頭推動下，港交所IPO總額大幅提升，較2019年上升18%。改革的作用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芯片法案」遏制不了中國發展

議論 風生

盛菱

美國時間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標誌著美國打壓中國又進一步。如果再加上即將成立的「芯片聯盟」(Chip 4)，美國似乎成功築起了一道「芯片鐵幕」，欲將中國完全隔離於外。然而芯片產業不是說靠幾百億美元就能成功發展起來的，也不是說靠一個有名無實的聯盟就能把霸權握在手中。中國的芯片產業有龐大的市場作支撐，有不斷突破的技術作支持，再加上數字經濟的特性，美國的「芯片鐵幕」注定會以失敗告終。

中國有實力打破美封鎖

「芯片法案」包括對芯片行業約500億美元的補貼、對半導體和設備製造25%的投資稅收抵免等扶持政策，其根本意圖是用大量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的方式，提高美國國內的芯片製造產能以及技術研發能力，同時試圖通過排他性的「地緣政治條款」迫使國際芯片巨頭企業「選邊站隊」，從而起到限制中國芯片製造業發展的作用。

為什麼說這一法案難以發揮真正作用？

第一，法案所涉金額有限。500億美元看似龐大，但對於美國「統治芯片行業」的目標而言，仍有巨大落差。有研究指出，美國建立完全自給自足的本地半導體供應鏈需要至少1萬億美元的前期投資，而「芯片法案」直接投向製造領域的500多億美元預算對半導體行業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同時，相關投

資分散到五年，政府補貼不足以彌補產業回流美國給企業帶來的額外巨大成本，其投資的整體影響和有效性在美國國內都面臨諸多質疑。如果美國無法靠這一法案建立起「具統治性的產業優勢」，又如何能全面「封殺」中國芯片產業？

第二，排他性條款作用有限。美國打壓中國科技發展非始於今日。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卡脖子」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些手段並沒有成功遏制中國半導體製造業的發展，反而有效促進了相關產業的迅速成長。美國的「芯片禁令」，客觀上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國內市場資源。以化學機械拋光設備為例，2017年美國應用材料、日本製造的拋光設備佔據了98.1%的國內市場，而今中電科電子裝備集團製造的8英寸拋光設備已經奪回了70%的國內市場。中芯國際深圳工廠預計在2022年開始正式生產，主要可生產28nm工藝的晶片產品，產能最高可達每月4萬片12寸晶圓。這些都是「迫出來」的，中國有這個實力去逐步打破封鎖。

第三，中國市場無法被忽視。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達4355.6億美元，同比增長5.98%。其中，中國市場的半導體銷售佔了全球的1/3，2020年中國半導體銷售額達1508億美元。目前中國芯片產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過去四個季度中，全球20家增長最快的芯片行業公司中，有19家來自中國。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只有8個。這些涵蓋了芯片製造至關重要的設計軟體、處理器和設備等領域，其收入增長速度是全球領先企業台積電或阿斯麥(ASML)的數倍之

多。正如美國科技企業一名高管所說：「沒有了中國市場，如何填補巨大的市場空缺？」

「芯片聯盟」名過於實

第四，「芯片聯盟」名過於實。美國對台灣、日本及韓國威逼利誘，欲早日組成所謂的「芯片聯盟」，外界預期將藉此制訂尖端半導體產業相關規範，牽制中國技術發展。日本暫且不說，韓國十分依賴中國市場，目前韓國生產的芯片60%出口到中國，同時韓國在中國的芯片工廠佔比極大，例如，三星電子的西安工廠佔其NAND閃存供應的40%，而SK海力士的無錫工廠佔全球DRAM供應的近一半。正如去年曾參選總統的國民力量國會議員安哲秀所說，若未找出「可以同時滿足美國及中國的奇跡解法」，就須尋找可以在美國要求下得到最大利益，同時將副作用降至最低的對策。」韓國要全面跟隨美國過華政策，就須承擔嚴重後果，這並不符合其國家利益。

當然，在美國全面過華的大背景之下，「芯片法案」及「芯片聯盟」必然會在一定時期裏對中國芯片產業發展起到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中國政府已有清醒的認識，更有充分的準備和應對。

需要強調的是，芯片產業高度全球化，各國分工協作；全球芯片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規律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美方一再濫用國家力量，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脅迫外交，試圖人為推動產業轉移、脫鉤，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割裂全球市場，在全球經濟深度交融的背景之下，這種行徑必將以失敗告終。

智庫研究員

善用空間數據平台 激活本港數字經濟動力

政策 思考

葉文祺 區浩馳

國務院早前印發《關於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提出要主動順應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趨勢，充分釋放數字化發展紅利，並指示各機關構建數字化履職能力，打造開放數據資源體系，通過建設數字政府引領社會數字化發展。筆者認同《指導意見》的見解，並相信這是解決香港社會難題的其中一個突破口。

特區政府正在籌建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目標是在今年年底或之前開通一站式入門網站，讓公眾免費下載來自政府部門的數百個空間數據集。筆者認為，CSDI能發揮的功能應遠不止於此。事實上，CSDI正好成為香港建設數字政府的奠基石。

《指導意見》提出，全面構建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加強對涉及國計民生關鍵數據的全鏈條全流程治理和應用，賦能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完善自然資源三維立體「一張圖」和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台，持續提升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國土空間規劃實施、海洋資源保護利用、水資源管理調配水平；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機制，統籌推進決策信息資源系統建設，充分整合多源數據研判趨勢。上述幾項意見，特區政府都可以借鑒參考，並通過CSDI落實。

提升私人企業參與程度

作為一個地理資訊系統，CSDI能整合來自不同部門和格式的數據，以互動地圖的方式呈現數據可視化，清晰展示不同數據之間的地理空間關係，方便政府內部和公眾使用分析。因此，CSDI可以成為公眾監督土地房屋項目進度的重要媒介，並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提供客觀分析基礎，快速收斂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分歧。

此外，《指導意見》又提出要形成推動數據開放共享的高效運行機制。香港特區政府亦訂下了相似的目標，於2019年在發展局下成立了空間數據辦事處，通過「年度空間數據計劃」推動跨部門空間數據共享，深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開放數據工作。然而，計劃目前尚處於「先量後質」的起步期，未來有需要持續地豐富不同數據集的信息含量。

雖然特區政府正籌建CSDI，但它與能夠利用大量實時數據模擬政策效果的數字孿生模型效果相距甚遠。此外，CSDI欠缺公營機構和私人企業的參與，難以激發數字經濟活力，遑論釋放紅利。

數字化是城市發展大趨勢。《指導意見》提出內容並非全新概念，部分早在去年《「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以及更早之前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特區政府應積極跟進，盡快在數字經濟大局中建立優勢。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助理研究員

積極落實「兩文三語」語言政策



教育 思考 李曉霆

自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香港社會一直有股力量透過不同渠道鼓噪並誤導市民說：政府要硬推「普教中」、「普通話」或「貶低粵語」等。如果這些風向僅是為回應或引領社會就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進行思考，那仍可以包容一二。但如果想以此再次炮製類似「反國教」事件，則應該引起特區政府及廣大市民警惕。

普通話教育說到底就是「兩文三語」這項基本語文政策，對於這項政策的關注重點，不應僅局限於廣東話與普通話「誰比誰更重要？」「粵語地位是否被貶低」這個層次，而應該關注和聚焦於普通話教育是否可以增進香港市民的福祉上。如果整個社會輿論僅是一味的引導香港市民狹隘的關注「誰比誰重要」這類問題上，不

僅無助於香港語文政策的發展，更可能出現嚴重的誤導，讓整個社會陷入撕裂，後果非常危險。

廣東話地位絲毫無損

首先，特區政府有責任推動普通話教育。普通話的法律地位源於憲法，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普通話與廣東話同時納入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是合理且無可指摘的。同樣，廣東話作為「兩文三語」中的一語，已足夠說明對其沒有不尊重或貶低，而是反映出廣東話作為香港地方交流語言的事實。

也正是廣東話的這種屬性，才需要對廣東話給予更多的尊重、保護。每一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市民珍視香港的本地語言、文化，這種情感不僅值得尊重，更值得理解。但如果有人想利用這種樸素的情感，不斷分化社會，妄圖再次製造社會分裂與矛盾，那麼社會都應予以抵制。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從講話脈絡上看，強調的不僅是香港特區的政治、經濟地位，這也包括香港獨特的文化地位與優勢。

特區政府自1997年首次將「兩文三語」確立為香港的語文政策之後，香港市民曾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但隨着香港教育問題不斷政治化之後，「兩文三語」政策則逐漸變為一句口號，甚至被不斷的挖空變為「兩文兩語」，在一些學校裏普通話教育早已淪為一門可有可無的「副科」、「閒科」。更加諷刺與弔詭的是，仍堅定完整實踐「兩文三語」這一政策的大多不是拿着政府公帑的官校、津校，而是國際學校、開設國際課程的直資學校、私立學校。

一些人對普通話教中文這一議題甚為敏感，但「普教中」只是實踐「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的一種手段，為的是強化和

實踐「兩文三語」這一目標的同時，又能讓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語文，達到雙贏的目的，這絕非一些人口中的洪水猛獸。

因此就特區政府落實「兩文三語」政策而言，現時急需討論的不是普通話和廣東話誰比誰更重要，而是從長遠來看，「兩文三語」這一政策是否對市民有益？也不是討論有否貶低廣東話的時候，而是應聚焦在新一屆政府如何、何時能制定出一套更加清晰、更符合兒童學習語言規律的語文教育發展路線。當然，現時更不是糾結個別媒體報道中所謂「全面推動普教中」是否表達準確的時候，而是教育局作為落實「兩文三語」這一政策的主體，要拿出怎樣的方案來推動「兩文三語」這一目標得以實現？

向社會傳遞正確信息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那

些努力落實「兩文三語」這一語文政策的學校、機構、學生個人，不僅沒有任何鼓勵，甚至因為社會政治事件而受到無謂的壓力。而對於破壞政府長遠政策發展的一些群體，卻不用付出任何代價。長此以往，不僅向社會傳遞錯誤的信號，更對落實「兩文三語」這一語文政策毫無益處。

現時的教育界生態要全面落實「兩文三語」政策並非易事，要考慮的因素也錯綜複雜。因此特區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先從鼓勵達到「兩文三語」這一目標的學生開始，讓那些認真追求夢想，實踐「兩文三語」這一目標的文憑試考生、學校能夠得到應有的認可？相信這並非難事，因為這種獎勵措施在其他課程體系中早有類似的做法。筆者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廣大教育同工、家長、學生一樣，期待特區政府拿出勇氣與行動力，為香港的未來承擔起應承擔的責任。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